

从范式论看自由主义 与干预主义的竞争 - 共生关系

杨建飞

摘要: 自由主义与干预主义是西方经济学思想发展中两个基本的流派和方向。自由主义与干预主义作为两种理论框架符合科学哲学历史学派库恩范式论的要求。具有“不可通约性”,常规科学的“解难题”、“库恩损失”等理论范式在竞争和评价中所表现出来的基本规定性。自由主义与干预主义两种学派和范式的竞争共生关系检验了库恩范式论的科学性、合理性和价值性。

关键词: 自由主义 干预主义 范式论

如果说波普尔证伪主义方法论在微观上从西方经济学理论检验、评价及假说准则等方面影响西方经济学学术思想创新的话,那么库恩“范式论”等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则成为经济学家们在宏观层次上分析评价不同理论体系的结构、比较优势、思想关联、经济学理论的社会文化背景、理论竞争力等问题的重要的参照系。今天,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的“范式”、“库恩损失”、“不可通约性”、“科学共同体”、“常规科学”、“解难题”等概念频频出现在经济学家的著作中,成为理清思路、分析问题的重要的工具和视角。

库恩范式论的基本思想是,科学家的知识生产是在一定的范式引导下进行的,范式就是科学家的思想信念、形而上学假说、解题工具、观察视角、资源组织形式,甚至是一种生活方式。范式规定了科学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决定了科学家的框架和战略,库恩说:“范式改变了,科学家所约定的世界也就改变了”。范式的用户和使用主体是科学家专业共同体,范式塑造并决定了科学共同体,科学共同体就是坚持范式并与范式共进退、共存亡的科学家群体。科学发展是由科学革命与常规科学编织成的一条突变与渐进相间隔的轨迹。科学革命是旧范式的放弃和新范式的构建选择,有大量非理性因素。常规科学就是在范式指导下,以范式为框架和工具,进行专业性的“解难题”的活动。常规科学推动了范式本身的拓展、应用化、深化和完备化。库恩认为,范式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不同的范式之间是不可通约的。库恩反对逻辑实证主义的归并原则,即把旧理论作为新理论的一个特殊情况加以包括的所谓“对应原理”。他认为,坚持不同范式的科学家们,对于基本问题、概念的理解不同,因此是不可能获得完全的理解与交流。正如语言翻译中存在着“译不准”一样,科学中存在着不同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科学家们对于不同范式进行选择时受制于复杂的个人心理、社会文化甚至是非理性因素,科学家们可能会放弃一个经验证据多的假说而去接受一个经验证据少的理论假说,这就是著名的“库恩损失”。库恩否认爱因斯坦相对论比牛顿理论进步,他认为两个范式之间的转换是“格式塔的转变”。库恩还坚持认为

为,一个优良的范式并不一定是说它有很高的与客观世界的符合性,而是说它是解题有用、有效的工具。工具只有好坏之分,并无真假区别。

分析表明,经济学历史上的相互依存、又相互竞争的自由主义与干预主义,其理论特征和运行发展符合范式论要求。从范式论思想框架出发,分析自由主义与干预主义各自的形而上学预设及本体论承诺、各自理论的系统性与自足性、两种范式的不可通约性、两种范式不同的方法论立场、专业性的“解难题”的绩效、在科学革命与常规科学不同时期自由主义与干预主义的主题问题取舍、两个范式之间的竞争与共生的博弈关系等问题,对于我们今天完整认识自由主义与干预主义两种范式各自的价值和不可替代性,推进西方经济学的思想创新和本土化、应用化,提高其现实解题能力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自由主义与干预主义对于“范式论”的适用性

自由主义范式的基本假说是个人主义和“市场出清”假说。干预主义的基本假说是市场失灵,供求不会永远平衡,在现代,主要是需求不足,为此,国家必须出面,对市场需求进行干预,以保持经济系统运行演化的稳定性和有序性。

从范式论角度看,自由主义和干预主义自成体系,自成一派,都有自己的基本假说、分析框架、价值标准、解题工具、主题问题和战略方向,符合库恩范式论的内在规定性的要求。自由主义和干预主义是经济学思想演化发展中两个最基本的流派和范式。

首先,自由主义与干预主义都是一种形而上学假说和信念。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哲理信念和假说,相信自然和自发的力量,认为经济过程是和谐的,每个个体都是理性的,对于价格反应也是灵敏的,个体自利行动会得到意想不到的公共利益和社会福利的改进。即“私恶即是公德”这一著名命题。国家强制力的介入只能破坏自然秩序,基本上是无效的。古典、新古典及当代自由主义首先表现为一种经济观、一种关于经济过程的形而上学信念、假说和心理预期,直觉基础上

自明的信仰和信念。弗里德曼说：“作为自由主义者，我们把个人自由，也许或者是家庭自由作为我们鉴定社会安排的最终目标……竞争的资本主义，即通过在自由市场上发挥作用的企业来执行我们的部分经济活动，是一个经济自由的制度，并且是政治自由的一个必要条件”。

干预主义首先也是作为一种先验信念和假说。干预主义对市场过程采取了一种非完美主义的理解，认为任何个人的自利行为有时可以达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和经济稳定运行，但在大多数时候却不能。正如凯恩斯所认为的那样，如果能，也只是一种特殊情况。干预主义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市场会出现需求不足、结构失衡、经济波动等问题。凯恩斯认为经济波动和周期是市场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特征”。只有一个超越一切团体利益之上，带有战略和全局眼光，以强制力为基础的国家力量的介入，才能使经济保持良性运转。因此，他们认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甚至国家资本的直接介入都是必要的。在希克斯的IS-LM分析之前，干预主义并没有给与国家干预和非市场出清以一种严格的逻辑和数理证明，只是一种经济哲学的信念、形而上学假说和心理预期。当代新凯恩斯主义坚持并维护“非市场出清”的假说和信念，他们在粘性工资、粘性价格、不完全信息基础上的数理分析是对于这种形而上学信念和假说的辩护及逻辑证明。

其次，自由主义和干预主义是一种方法论立场和解题程序，符合范式论的要求。自由主义倡导个人主义方法论，要求从个体和微观出发分析问题，认为，即使是总体，也是由全体的线性加和而构成。集体主义策略并不会引起所谓“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整体优化结果。个人的自由性、自足性、自我决策是一切分析的前提。国家干预主义往往表现为方法论上的一种集体主义，其分析往往偏好于整体社会效应，认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任何个体相加都不等于社会，个人理性不一定会导致集体理性。因此，彻底的个人理性行为必然导致外部性、垄断、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只有从宏观利益出发，倡导集体主义，进行总量控制和平衡，注重整体性，才能维护经济系统的运转。

我们认为，一旦经济学家选择自由主义或干预主义范式，他就会以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去看待问题、分析并解决问题，并顽强地维护这一立场。相信不同范式的经济学家会在相同的地方看出不同的问题，犹如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之中一样。例如对于“滞胀”的分析，凯恩斯主义与自由主义就有着根本不同的解释。

二、自由主义和干预主义两种范式的不可通约性和非替代性

自由主义与干预主义的思想源远流长，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就有集权与分权、集体与个人、自由与控制的不同思想方向及其争论。近代初期，重商主义以增加国家财富和收入为主要目标，强调国家干预。重农主义强调自然秩序和生产运作的自然性，强调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重要性，主张自由、自主经营。近代后期，西方经

济思想界被亚当·斯密自由放任的市场理念所支配，国家干预的思想被淡化。20世纪30年代，产生于特定时代的凯恩斯主义在重商主义之后又一次强调了国家干预的重要性和有效性，并对20世纪的经济思想和全球经济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时自由主义居于非主流地位。70年代后，自由主义又得以光大，干预主义在信息经济学和数理基础上修改了自己的基本原理并调整了辅助假说，发展了新凯恩斯主义。目前，干预主义与自由主义形成一种竞争共生的局面。

历史上自由主义与干预主义长期争论、并存又独立发展，本身就说明了其两种范式的不可通约性和不可替代性，没有一方可以完全取胜。正如量子力学中的微观粒子的波粒二象性一样，二者不相容但又互补，波动性和粒子性是同一粒子不可分割的两种属性。现代市场经济内在包含了国家的干预，同时，干预主义仍立足于市场机制上，两种体制各有局限，不可替代，形成了一种互补关系。目前，一个完整有效的经济形态都是自由主义与干预主义相结合的“混合经济”。

针对新古典学派的“市场出清”假说，凯恩斯说：“经典学派的前提，是适用于一种特例，而不适用于通常情景”。而弗里德曼明确反对凯恩斯主义，主张经济自由。他说：“政府永远做不到像个人行动那样的多样化和差异化的行动，通过在自由市场上发挥作用的私有企业来执行我们部分的经济活动，是一个经济自由的制度”。即是说自由主义与干预主义两种范式是不可通约的，都有自己独立的边界。自由主义面临着外部性、信息不完全性、垄断和公共产品供给等困境和问题，虽然相对于自由市场机制实现帕内托最优方面的优势而言，外部性引起的社会福利损失是少量的，但问题是存在的，市场机制的局限是存在的。干预主义在解决外部性问题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对于市场机制是一种替代与补充，但却仅仅是严格地局限于这一点，计划并不能完全替代市场，只是一种补充，但计划和干预同样是独立的，不可为市场所替代。即在基本原理和主要问题上，干预主义与市场机制是根本对立的。自由主义与干预主义范式在外部性等问题上的对立和绩效差别是两种范式不可通约性的证明。因此，在经济发展史上，并没有出现过自由主义与干预主义谁完全替代谁的状态。如凯恩斯主义在60年代居于主导与主流地位，而自由主义则处于潜伏状态，但它的一些思想仍被参考。而在自由主义兴盛的80年代，虽然自由主义占主流地位，但凯恩斯干预主义思想仍然能被接受。由于两种范式的不可通约性，保证了两种范式的独立性和不可替代性，只是由于时代和情景的不同，一个占主流和主导，而另外一个占次要和非主导地位。同时有限的交流性则保证了两种范式在一些交叉问题上的共同点、相容性，说明了两种范式的互补性、相关性和渗透性。对于描述同一经济系统时，两个范式是互补的，缺一不可的。

三、“解难题”基础上自由主义和干预主义之间的竞争及其成长

科学发展模式是科学哲学的中心问题之一。库恩把科

学发展描述成为一个由科学革命与常规科学交替的动态过程。科学革命是由于科学家共同体面临日益增多的反常而不得不采取的一个策略(往往是被动的),即放弃一个旧的范式,选择一个新的范式,这一过程往往是非常艰难的,犹如宗教改革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常规科学是科学家们在范式框架指导下的“解难题”的一种专业化、日常化的活动。“解难题”拓展了范式范围,提高了范式框架的解题能力,使得范式日益丰富并走向成熟。科学革命不是家常便饭,也不是一般科学家所能企及,其发生是间断性的、随机的、稀缺的。而专业科学的“解难题”活动却是日常的,引导着范式本身的运行、深化和成果的产出,理论和学术意义非常重大。

经济学家选择自由主义还是干预主义作为范式和解题工具依赖于范式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中的解题能力和自身的深化。自由主义与干预主义两种范式存在着一种互补、竞争的动态博弈关系,正是在这种竞争共生关系中,不同范式通过“解难题”推进了各自自身的深化与进化。

西方经济学历史上曾发生过7次“革命”: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革命,新古典学派的“边际革命”,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和国家干预革命,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革命,不完全市场竞争论的张伯仑革命,理性预期革命和目前正在兴起的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革命。每次革命都是对于主流范式在“解难题”中局限的识别,是经济学家们面对反常问题而寻求新的适应于目前情景的新范式过程;是不同理论范式竞争,最后新范式代替旧范式成为主导的过程。研究表明,经济学7次革命的基本思想和观点源远流长,同时并存于近代古典经济学以来任何一个时代的思想库中,但只有那些适应于时代要求的思想原理和范式,才会被选择并发扬光大,成为主流思想和范式,领导经济学专业化的“解难题”活动。这时,其他思想和范式会处于在野地位和配角角色,一直与主流角色处于竞争共生关系之中,等待时机,一旦条件成熟和情景适宜,它们会上升为主流和主导范式,领导下一期的专业科学的“解难题”活动,并通过“解难题”而自身成长进化。

历史上,重农学派和古典自由主义者之所以取胜,一方面是由于它们对自由竞争的中小企业群和农业地位及其影响的科学解释,同时也是文艺复兴以来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兴起胜利的结果。凯恩斯国家干预的思想在历史上早已存在,在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和需求不足的情景下,干预主义的经济思想和范式具有明显的“解难题”能力和解释力(并没有相当强的预见能力),因而被官方看中,被社会和学术界认可,从而引发了“凯恩斯革命”。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无论就其逻辑严谨、数理方法还是微观基础等方面都没有高出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也没有更多的经验证据支撑。与他同时代或后来的弗里德曼的自由主义、米塞斯及哈耶克的自由主义,在整个30-60年代,都处于被遗忘和潜伏状态,它们虽然并不比主流范式缺少思想创新之处,但由于不适宜情景,缺乏有效的“解难题”能力而充当边缘化的角色,与主流框架无缘。到了70年代,随着凯恩斯主义自身微观基础上的逻辑困难、“滞胀”及全球问题、国家权力趋强等问题的出现,自由主义的思想又被重新发现。在基本原理上

并没有大的改进的货币主义、公共选择理论、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等自由主义思想一时间被官方、社会和学术界共同认定为“革命”,贴上了这样或那样的标签,盛行一时并成为主导范式,不断参与企业与企业官方的“解难题”活动并由此也引起自身的深化发展。这时干预主义由于不适应于时代和特定的情景,因“解难题”的乏力而退出了主流思想和主导范式,等待时机,积聚力量,力图再次东山再起。

自从亚当·斯密提出“看不见的手”的自由主义范式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开始了在范式指导下的“解难题”活动并以此为基础推进了范式的深入和成长。后来,马歇尔、瓦尔拉斯及帕累托等人用逻辑分析和数理分析为自由主义范式建立了严格的基础,并把“市场出清”的假设引申到资本、劳动力、福利等问题的解决上,拓展了古典自由主义原理的应用空间和领域,维护了自由主义范式的深化和运行,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专业“解难题”活动。到了20世纪,弗里德曼、卢卡斯、贝克尔、布坎南、纳什、阿玛蒂亚·森等人把自由主义的思想范式和框架应用于家庭、人力资本、福利、犯罪、企业内部治理与机制设计、宏观经济政策批判、公共政策制订、经济伦理关系等问题的解决上。杨小凯等人的新兴古典学派,从自由主义出发,利用市场分工原理对于效用、效率、城市化、国际贸易、体制改革等问题给出了新的科学解释。促进了自由主义范式的完备化、深入化、有效成长与进化。

同样,干预主义范式引导了经济学家共同体的“解难题”活动,同时“解难题”也促进了范式自身的进化与成长。干预主义思想同样源远流长。重商主义对于萌芽于古希腊柏拉图思想中的国家权力干预思想作了分析和阐释。李斯特从培养民族工业竞争力角度对于国家干预进行了论述。而凯恩斯则从需求不足和市场的波动性出发,系统分析论证了国家干预的必要性,提出了以财政政策为主的政策框架。以萨缪尔森为领袖的新古典综合学派,在凯恩斯干预主义范式引导下,引入了动态分析和长期分析,建立了著名的IS-LM分析,深化了干预主义对于工资、物价货币、消费、投资等问题的解答。而罗宾逊夫人、张伯仑等人则引入了不完全市场理论,分析了垄断及其经济损失,反对垄断,强调收入差别调控,维护了干预主义的范式,进行了良好的专业“解难题”活动。新凯恩斯主义学派坚持“非市场出清”的干预主义思想和范式,引入了不完全信息分析,提出了粘性假说,分析了市场的时滞效应,解决了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工资、物价、成本的调整与变化,深化了凯恩斯主义的现代微观经济学基础,建立了凯恩斯主义对于不完全信息等境况的适应性,推进了干预主义范式的深化和运行,进行了现代意义上的专业化的“解难题”活动。

进入21世纪后,市场垄断的加剧,特别是恐怖主义对于自然、自由经济秩序思想的冲击,最近连串曝出的安然、世界通讯等美国大公司的财务假账丑闻,又引起了人们对于干预主义的兴趣及注意力。如何克服电子信息技术和网络环境下,在自由竞争市场中,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问题,如何解决市场垄断、高新技术、外部性等问题,如何设计一个完备的公共政策体系和内部治理机制已成

为全球关注的重大问题。克林顿政府的高科技产业导向和国家干预策略引导下新经济的良好的业绩给人们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又一次引起人们对于自由主义范式局限性的认识。布莱恩·斯诺登分析指出,“在1998年,由于世界经济处在一种不稳定和对广泛的通货紧缩的恐惧之中,凯恩斯的灵魂又想向我们靠拢”。因此,目前,对于自由主义范式的主导地位、“解难题”能力及国家干预主义范式的前景进行预测,是一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学术问题。

四、自由主义与干预主义范式竞争及博弈过程中的“库恩损失”

“库恩损失”全称是“库恩经验损失”,它是指在科学史上特定的时期,两个相互竞争的范式处于经验事实的包围中,面对面进行竞争时,最后在博弈和竞争中取胜的并不一定是经验证据多的范式,而往往是经验证据少,可解释的经验事实少但有较高心理预期的新范式。后来的科学事实也证明,科学家们这种行为是合理的、有成果的。新范式作为一种创新思想,开始往往是幼稚的,缺乏竞争力及实力,这就需要眼光和洞察力。科学家们的这种事前选择行为表面看似似乎是非理性的,但结果和收益却能达到最大化,其行为实质上是理性的。那种有创见、有大胆预言和猜想、有理论新颖性的范式相对于完美成熟的旧范式往往是有可能被选择的。有时范式的选择还依赖于社会情景和社会价值导向。如科学史上日心说和地心说的竞争关系就是一种符合“库恩损失”的典型实例。我们认为自由主义与干预主义两种范式博弈取胜的过程及方法论立场符合“库恩损失”假说。

历史上,威廉·配第自由主义战胜强调国家利益的重商主义时,其本身所具有的经验内容并不比重商主义多。但它符合那个时代古典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和社会时尚,并且对于日益兴起的民间中小企业的发展方向具有洞察力、预见力。

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时期,在特定的时期和状态下,自由主义的范式在解决失业、市场需求等现实问题的能力方面面临着严重的困难。但是自由主义范式在理论上并没有失效,它在市场一般均衡、价格机制、产量及福利最大化等方面的逻辑证明仍是科学的,在这些问题上所积累的有利证据远远大于在市场供求失衡、失业、消费需求等方面所面临的不利证据。但是经济学家通过直觉洞察到,在目前特定的时点和状态下,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无论对于解决现实问题,还是在改进古典和新古典基本原理的学术创新上都是极有前途的。因此,直觉基础上的心理预期认为,放弃自由主义范式,选择经验证据和可解释事实相对较少,但却符合时代情景和特定环境的国家干预主义范式将是收益较大的。历史事实也证明,此后,正如“库恩损失”所描述和分析预测的那样,经验证据和事实少的凯恩斯干预主义范式战胜了经验证据和事实多的自由主义范式,成为经济学理论的主流范式和框架,也成为官方经济学及其政策指南。事实上,即使今天,在对30年代大危机这一事实的解释上,弗里德曼货币

主义学派还是坚持认为,大危机本来只是一次普通的衰退,正是因为政府选择了扩大公共支出,放弃了修复货币供给机制去应对通货紧缩的错误政策才把一次普通的衰退诱导为大危机。大危机并不是自由主义的不利证据,更不是凯恩斯主义的有利证据。

20世纪70年代,弗里德曼自由主义范式在竞争中战胜凯恩斯干预主义范式时,同样存在着“库恩损失”和经验证据上的反不对称性优势。弗里德曼的自由主义范式借以反对和挑战凯恩斯干预主义范式的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现象。但这时的凯恩斯主义范式已经非同1936年《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发表时的情景,经过萨缪尔森等人的数理化、长期化、动态化工作及对于市场理论、货币理论、工资理论、需求理论、就业理论的创新,经过罗宾逊夫人和张伯仑的不完全市场理论、价值理论及分配理论的发展,干预主义范式积累了大量的经济事实和实验证据。单从实验证据的范围和数量看,干预主义并不亚于自由主义,但是相信或对于自由主义范式前景有良好预期的经济学家们认为,自由主义符合目前的经济情景,是有前途的,选择自由主义范式和工作框架可以获得更多的学术创新收益和经济政策业绩,因此,可能受到社会价值观的暗示,大部分经济学家开始模仿、互动、传染、相互影响并最终选择了在20世纪50年代已经存在、备受冷落的弗里德曼的自由主义及货币主义。正如布赖恩·斯诺登所说:“70年代期间,新古典(自由主义)逐渐兴盛,而新凯恩斯主义模型逐渐失宠,这并不仅仅是因为高通胀使得固定价格模型显然不现实这个原因”。事后,英、美等国的私有化导向的改革业绩也证明了经济学家们选择自由主义范式是理性的、合理的、有效的。

进入21世纪后,知识经济方兴未艾、全球化与民族化竞争共生的趋势日益强化、高科技产业裂变式发展、经济风险日益增大,这一切都把我们引进了一个新的不确定的经济社会环境。自由主义和干预主义两种范式在新的情景下又展开了竞争和博弈,为争取主流范式和主导框架角色而努力。我们认为,库恩范式论中的“不可通约”思想、“库恩损失”假设、专业科学的“解难题”思想、范式转换思想、科学危机与反常的思想对于今天西方经济学范式竞争力、适应性、解题力的提高和创新方面还有着智慧的启迪和方法论上的引导作用。

注释: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文版,87页,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84。

库恩:《必要的张力》,中文版,171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

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中文版,12、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文版,7、26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布莱恩·斯诺登:《与经济学大师对话——阐释现代宏观经济学》,中文版,32、10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西安 710069
(责任编辑:S))